



六朝时期的博弈之俗

罗卫忠 (江西省博物馆)

早在先秦时期,博弈活动就成为古代中国一种奇特的社会习俗和文化现象。

六朝时期,随着各民族交流机会的增多,各民族习俗文化的融会贯通,社会物质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商业经济的繁荣,博弈活动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并形成奇特的博弈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对后来中国习俗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广,仍然值得今天的人们玩味。

一. 六朝时期的博弈风气

六朝时期,博弈风气鼎盛,整个社会,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不论贵贱,不分男女,无论老少,都有嗜好博弈之戏者。



唐《内人弈棋图》,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宋书·始安王休仁附休祐传》载,刘宋武帝刘裕的儿子刘休祐任荊州刺史时,手下有个叫苑景达的人,善于弹棋,宋太宗想把他召进宫陪自己玩,刘休祐坚决不肯,以此遭受太宗的诘责。据当时史料记载,南朝各代帝王有不少常玩博弈之戏。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宋孝武帝弟明帝刘彧,齐明帝,都爱博弈。尤其是齐明帝,“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欲笃。”(《南齐书》卷53《虞愿传》)。

一些外戚也嗜好博弈。《宋书·萧思话传》载,刘宋时期的萧思话,是孝懿皇后之弟。当他十余岁时,未知诗书,整天“以博诞游遨为事,好骑房栋,打细腰鼓,侵暴邻曲,莫不患毒之”。在这样风气影响之下,当时的士大夫也都热衷博弈之事,以能博弈而感到自豪和荣耀。

有关六朝名士袁耽、桓温、温峤、谢安等人嗜好博弈的轶事,正史中可以搜索出不少的文字记载。《晋书·袁耽传》

载,“耽字彦道。少有才气,倜傥不羁,为士类所称。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尚有负进,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济于耽。而耽在艰,试以告焉。耽略无难色,遂变服怀布帽,随温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者闻之而不相识,谓之曰:‘卿当不办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万一掷,直上百万。耽投马绝叫,探布帽掷地,曰:‘竟识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

商人群体是参与博弈活动的重要主体之一。《世说新语·任诞》记载,东晋温峤未作官时,经常与扬州、淮中一带的商人樗蒲博弈,但不是商人的对手。下层社会虽然生活穷困,好博弈者也不乏其人。为求生存,博弈也可能是某些“无以为衣食业”的无业游民唯一的谋生手段。

整个社会浓厚的博弈风气也影响了孩童、少年,不少人年少时便爱上且精于博弈活动。《太平御览》卷754引《江表别传》载,东晋济阳江表,“年十一,始学樗蒲”。《宋书·何尚之传》载,庐江何尚之,“少时好樗蒲”。《宋书·竟陵王诞传》载,司州刺史刘季之“少年时,宗恣共蒲戏,曾手侮加恚”。

贵族、官僚、士大夫、商人等家人女眷也是当时博弈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斗草、围棋等游戏项目是她们经常乐于参加的活动。《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五月五日》引南朝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节录)说:“长丝表良节,金缕应佳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献踏依洛浦,怀佩似江滨。”

二. 六朝时期博弈之戏的主要种类

六朝时期,流行于帝王、贵族士大夫和民间的博弈形式多种多样,主要的形式有:围棋、六博、樗蒲、双陆、弹棋、斗草、斗禽(鸡、鸭、鹅)等。

1. 围棋

围棋是一种高雅的娱乐活动,世传为尧所造,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已有关于“围棋”或“弈”的记载。作为一种可以益智的游戏之物,六朝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起来,围棋竞技活动得到进一步普及。《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载,孙策曾与吕范对弈,“策从容独与范棋”;《三国志·陆逊传》载,大将陆逊足智多谋,于嘉禾五年(236年)奉命与诸葛瑾攻曹魏襄阳,临战之际犹“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东晋时期,王、谢大族中人多爱好围棋,如《晋书·王导传》载,王导尝与其子王悦“弈棋争道”。王导次子王恬“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当时的围棋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棋品规则,已有九等之分,最高者称为“入神”,表示其棋艺



唐《弈棋仕女图》，绢本设色，纵横33厘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收藏

已达到变化莫测的程度。其下再分“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老愚”、“守拙”数等。

2. 六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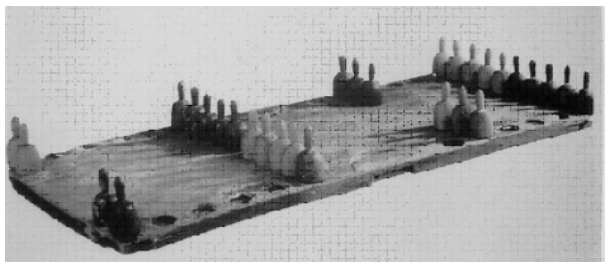
六博所用的棋子双方各为六枚，六黑六红，又有骰子六枚，故称为“六博”。六博号称“博戏之祖”，六朝时期，六博成为重要的博弈方式。但由于其“数术短浅，不足可玩”（《颜氏家训·杂艺》），很快便被更为有趣而富于刺激的博戏樗蒲、双陆（握槊）等所取代。

3. 樗蒲

樗蒲，也作“樗蒲”，又名掷卢、呼卢、五木，是在六博游戏的基础上予以改进与变异而形成的，类似后来的掷骰子（色子），随机性很大，主要靠运气取胜，其游戏规则比掷骰子又稍复杂些。樗蒲以投掷决定胜负，快捷简单，所以，用樗蒲博弈自产生以来即为各阶层的人们所喜爱，《三国志·张顾诸葛步传》载，孙吴诸葛融领兵驻公安时，常会宾客，每次宴会，都让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有博弈，或有樗蒲，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此外，宋武帝刘裕、宋孝武帝刘骏，以及桓温、桓玄、袁耽、王献之等人都善于樗蒲。

4. 双陆（握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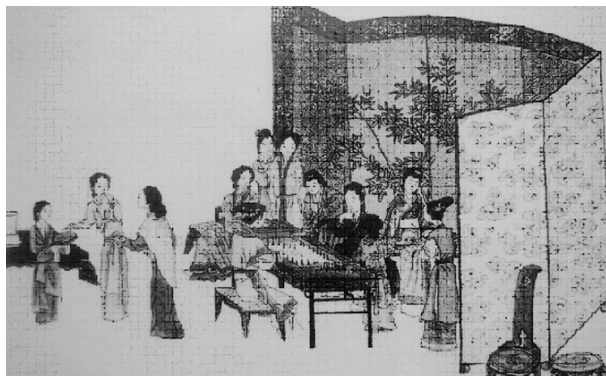
双陆，北方人称“握槊”，它是中国古代流行时间最长、地域最广的博戏。握槊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本胡戏也”。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始于西竺”。西竺就是天竺，乃印度的古称。考察当时的有关文献，此说的根据似较充足。握槊是流行于北朝宫廷的一种博戏。盛行于北方的握槊，在南方则名为双陆。宋朝洪遵《谱双》叙云：“双陆最近古，号雅戏，以传记考之，获四名，曰握槊，曰长行，曰婆罗塞戏，曰双陆。”这说明双陆与握槊，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流传地区不同，其形制则是一致的。双陆的棋盘左右各有六



辽宁法库县出土的辽代双陆棋具

路，故名“双陆”。这种游戏由于比较高雅，又富有一定博弈性，所以深得奢侈挥霍的贵族士大夫们的喜爱。

握槊在北方流行的同时，双陆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流行起来。据载，侯景发动叛乱时，“湘东王绎军于郢州之武城，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双陆棋戏图

湘州刺史河东王誉军于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阳王綦军于西峡口，托云俟四方授兵，淹留不进。中记室参军萧贲，骨鯁士也，以绎不早下，心非之，曾与绎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绎深衔之。”这是所能见到的比较早的有关双陆的记载。

5. 弹棋

《西京杂记》载，弹棋起源于汉成帝时刘向所作。

东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执政，倡导生活俭朴，对宫人的管束非常严，所有博弈之具一概不许进入宫中。弹棋等游戏活动受到了禁止，一时没有多大的市场。宫人们便模仿弹棋之戏，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

《弹棋经后序》曰：“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骰槊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云：“弹棋迹近世雅戏，消愁释愤，时可为之。”弹棋是一种雅戏，六朝时期在上层社会中非常流行，还出了不少弹棋高手。这一时期，人们对弹棋的沉溺，并不亚于围棋。南朝刘宋的王敬弘、孔琳之、孟灵休、杜道鞠、王休祐以及北朝后赵的石尊无不精于此道。《南史·张融传》载，“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唐，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也。”同时还有许多文人以诗词歌赋咏颂此戏，南朝梁简文帝作《弹棋论》，梁元帝作《谢东宫赐弹棋局启》，由此可见当时弹棋流行之盛。

6. 斗草

《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五月五日》引南朝梁王筠《五日望采拾诗》（节录）说：“长丝表良节，金缕应佳辰。结芦同楚客，采艾异诗人。折花竞鲜彩，拭露染芳津。含娇起斜眄，敛笑动微嚬。献踏依洛浦，怀佩似江滨。”可见当时妇人之间有“斗草”之戏。

7. 斗禽

六朝时期，斗禽之博戏在贵族士大夫阶层十分流行，主要有斗鸡、斗鸭、斗鹅等形式。

梁朝简文帝、陈朝徐陵都撰写过《斗鸡》之文，活灵活现地刻画了斗鸡时紧张激烈的场面，抒发了斗鸡给人带来的极大快乐。梁简文帝的《斗鸡》诗云“欢乐良无已，东郊

春可游。百花非一色,新田多异流。龙尾横津汗,车箱起戍楼。玉冠初惊敌,芥羽忽猜侑。十日骄既满,九胜势恒道。脱是田饶见,堪能说鲁侯。”

六朝时期斗鸭、斗鹅之类博戏也所在皆有。《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记载魏文帝派人向孙吴要斗鸭、长鸣鸡等物。又《三国志·陆逊传》载,吴国孙权的儿子建昌侯孙虑十分迷恋斗鸭游戏,他在堂前设立了小巧精制的斗鸭栏,畜养斗鸭于栏内水池中。《宋书·王僧达传》载,太子舍人王僧达,一次因生病告了假,“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世说新语·忿狷》载“桓南郡(桓玄)小儿时,与诸从兄弟各养鹅共斗,南郡鹅每不如甚,以为忿,夜往鹅栏间,取诸兄弟鹅悉杀之。既晓,家人咸以惊骇,云是变怪,以白车骑,车骑曰:‘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

三、六朝时期博弈之戏的雅俗分际和博弈之道

六朝时期的博弈之戏,不论参与者身份贵贱,不分各种形式,都有雅俗的分别。有的纯粹是一种娱乐益智的嗜好,有的纯粹是为了消闲,有的则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性动机,有的则完全是为了“博财”,也就是说纯粹是赌博。不同人的博戏,不同场合的博戏,甚至是同一个人不同时间的博戏,其雅俗分际,自有天壤之别。

比如,宫廷王府和贵族官僚的宅第中流行的斗禽,将两只性情凶猛的家禽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啄咬、攻击,以定胜负,有时纯粹就是以此来寻求乐趣,有时也可能是一场达官显贵们或大或小的赌博活动。博弈也常常作为聚会宴饮中的助兴项目,不仅民间如此,就是清流名士、王公大臣的宴饮交游也是多以博弈助兴。博弈之事率性而为,足为适性怡情之具。不少名人士大夫看重的是在赌场上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天性,从而求得一种社会认同,博得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东晋名士袁耽即是这类典型。《晋书·袁耽传》载,袁耽在居丧期间脱掉丧服,去帮助另一位名士桓温赢回所欠的巨额赌债。袁耽在樗蒲局旁意气飞扬,“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探布帽对人曰:‘汝竟识袁彦道(耽字)否!’”

因此,同一种博戏方式,有时是雅戏,有时可能就是赌博。史载萧梁时期的朱异“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

博戏需要智慧,如下围棋,必须要精于计算。各种博戏,是靠技巧取胜,斗的是智慧。所以,通解“博弈之戏”,往往被视为有“聪敏”和“有才艺”之人。“有才艺”更是帝王、贵族和士大夫们的体面,以及身份的象征。史载张僧皓“尤好博弈,戏不择人,是以获讥于世”。《世说新语》记载:“王子敬(献之)数岁时,尝看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嗔目曰:‘远惭荀俸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博弈对于妇人而言,其主要意义是排遣孤闷的日常消遣的主要手段。

博弈具有游戏性、竞争性,参与博弈的人往往能在其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而这种精神解脱又是其他场合很难得到的。因而自产生以来,博弈即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与广泛参与,具有“社会化”的特点。六朝时期追求刺激性也成为推动博弈社会化、普遍化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政局动荡,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受到一定影响,人们需要从事一些活动来解除苦闷。参与博弈者往往能在其中体验到其他场合很难得到的精神上的快感。这也是当时某些人乐于博弈娱乐的重要理由。

有些场合的博弈之戏则带有具体的事功目的:

《南齐书·李安民传》载,“讨晋安王子勋,所向起捷。事平,齐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君主,樗蒲官赌。”这是为了庆功。

《梁书·韦叔传》载,天监四年(506年),梁朝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曾被北魏大军围困,豫州刺史韦教与征北将军曹景宗率部助昌义之,魏军被击败后,昌义之为感谢解救之恩,“请曹景宗与教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

《世说新语·假谲》:谢玄年少时,好戴紫罗香囊,腰间垂挂着绣帕之类的物品。谢安以此为忧,但又不想伤他的自尊心,便骗他和自己赌博,在获胜得到这些佩饰之后,“即烧之”。这是谢安用博弈之戏来“教育”后辈。

有些场合的博弈之戏则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性动机:

《晋书·刘裕传》中的刘裕“于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以及输米数百斛后求袁耽助赌的桓温等,都是以获得钱财为主要目的的博弈。《太平御览》卷754引《晋书》载,东晋桓玄,“见人有好园宅,悉欲取之,勒以樗博而赌之”。

《南史·颜师伯传》载,一次宋孝武帝刘骏与黄门侍郎颜师伯樗蒲,刘骏先掷出一个雉,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必胜无疑。谁知颜师伯撒手掷出一个卢,刘骏大为失色,颜师伯见状,急忙收起五木,说:“几乎掷出个卢来。”这一天,颜师伯一输百万。这是颜师伯向皇帝表示忠心的博弈。

博弈能够充分体现出参与者性格和人格。六朝时期的人们常以此来了解某个人物。《世说新语·忿狷》:桓宣武与袁彦道樗蒲。袁彦道齿不合,遂厉声掷去五木。温太真云:“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世说新语·识鉴》记载:“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形据上流,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樗博,不必得则不为。’”桓玄代晋自立后,刘裕、刘毅、何无忌等起兵攻伐之,“玄自闻军起,忧惧无复为计。或曰:‘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

总而言之,深入探讨六朝时期的博弈之道是十分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刘慧中)